

S b K 星经典

牛津六讲

人类学 与古典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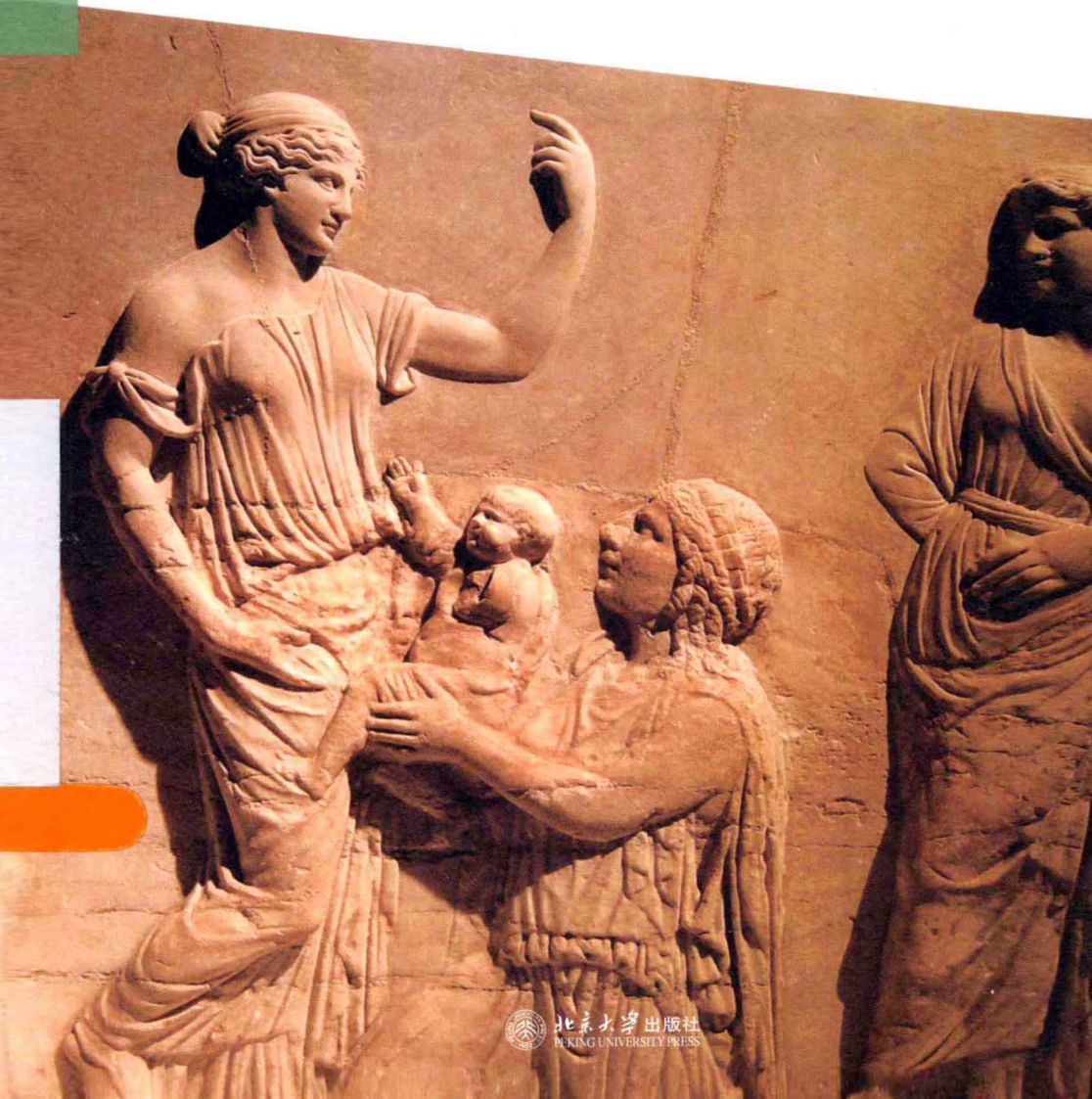
[英] R.R.马雷特 编
何源远 译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Six Lectures

R.R. Maret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六讲

人类学 与古典学

[英] R.R.马雷特 编
何源远 译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Six Lectures

R.R. Maret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六讲:人类学与古典学/(英)马雷特(Marett, R. R.)编;何源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

(沙发图书馆·星经典)

ISBN 978-7-301-22589-9

I. ①牛… II. ①马… ②何…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6932号

书 名: 牛津六讲——人类学与古典学

著作责任者: [英]马雷特(Marett, R. R.) 编 何源远 译

策 划 编 辑: 王立刚

责 任 编 辑: 王 莹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2589-9/C·0911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pkuswsz@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9印张 119千字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古典人类学指近代学科发生以来(19世纪中叶)出现的最早论述类型。就特征而论,它大致相继表现为进化论与传播论,前者考察人文世界的总体历史,主张这一历史是“进化”的,文明是随时间的顺序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后者叙述人文世界各局部的历史地理关系,视今日文化为古代文明之滥觞。

“古典时期”,人类学家广搜民族学、考古学与古典学资料,心灵穿梭于古今之间,致力于解释改变人文世界“原始面目”的因由,他们组成了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一代风骚。

古典人类学家抱持远大理想,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与局部进行了历史与关系的大胆探索。

兴许由于理想过于远大,古典人类学家的探索有时不免流于想象,这就使后世学者有了机会,“以己之长攻其所短”。

20世纪初,几乎只相信直接观感的人类学类型出现于西学中,这一人类学类型强调学者个人的耳闻目见,引申实验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于微型区域的“隔离状”的研究中。

这一学术类型被称为“现代派”。

现代派并非铁板一块。虽则现代派崇尚的民族志基本依据对所谓“原始社会”与“乡民社会”的“田野工作”而写,但学者在分析和书写过程中所用之概念,情愿或不情愿地因袭了欧洲上古史既已形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曾在古典人类学中被视作认识的“客体”得到过考察。另外,在现代派

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诸如法国社会学派的比较之作,及美国人类学派的历史之作,都更自觉地保留着浓厚的古典学派风范,刻意将观察与历史相结合。

然而,现代派的确使民族志方法流行起来,这使多数人类学叙述空前地注重小写的“人”,使其制作之文本愈加接近“普通人生活”的复述。此阶段,“直接观察”“第一手资料”的“民族志”渐渐疏远了本来富有神话、宇宙论与历史想象力的大写的“人”的世界。

现代派“淡然”远离人文世界渊源与关系领域研究。这一做派到1950年代至1980年代得到过反思。此间出现的新进化论派、新世界史学派及新文化论派,局部恢复了古典派的“名誉”。

可是不久,这个承前启后的学术“过渡阶段”迅即为一股“洪流”冲淡。后现代主义给人类学带来“话语”“表征”“实践”“日常生活”“权力”等等诱人的概念,这些概念原本针对现代派而来,并偶尔表现出对于此前那个“过渡阶段”之成果的肯定,然其“总体效果”却是对于现代派“大历史”进行否定的新变相(也因此,后现代主义迅即被众多“全球化”的宏大叙述替代,并非事出偶然)。

当下西学似乎处于这样一个年代——学术的进步举步维艰,而学者的“创造力自负”和“认识革命迷信”依然如故。

在中国学界,古典人类学也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

进化论思想曾(直接或间接)冲击清末的社会思想,并于20世纪初经由“本土化”造就一种“新史学”,对中国民族的“自传”叙述产生深刻影响。接着,传播论在清末以来的文化寻根运动及192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的民族学研究中得到了运用。西学中出现现代派不久,1930年代,以燕京大学为中心,同样地随之出现了建立现代派的运动,这一运动之一大局部,视现代派民族志方法为“学术原则”,对古典派冷眼相看。与此同时,本青睐传播论的中国民族学派,也悄然将以跨文明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传播论,改造为以华夏古史框架内各“民族”之由来及“夷夏”关系之民族史论述为主干的“民族学”。

“中国式”的社会科学“务实论”与历史民族学“根基论”,消化了古典

人类学,使学术逐步适应国族建设的需要。

1950年代之后,古典人类学进化论的某一方面,经由苏联再度传入,但此时,它多半已从学理转变为教条。

而学科重建(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再度进入一个“务实论”与“根基论”并重的阶段,一方面纠正1950年代出现的教条化误失,一方面复归20世纪上半期学术的旧貌。

学术的文化矛盾充斥于我们亲手营造的“新世界”——无论这是指世界的哪个方位。在这一“新世界”,搜寻古典人类学之旧著,若干“意外发现”浮现在我们眼前。

经典中众多观点时常浮现于国内外相关思想与学术之作,而它们在当下西学中若不是被武断地当作“反面教材”提及,便是被当作“死了的理论”处置,即使是在个别怀有“理解”旧作的心境的作者中,“理解”的表达,也极端“谨慎”。

而在今日中国之学界,学术风气在大抵靠近西学之同时,亦存在一个“额外现象”——虽诸多经典对前辈之“国学”与社会科学论著以至某些重要阶段的意识形态有过深刻影响,又时常被后世用来“装饰”学术论著的“门面”,但其引据对原版语焉未详,中文版又告之阙如(我们常误以为中文世界缺乏的,乃是新近之西学论著,而就人类学而论,它真正缺乏的,竟是曾经深刻影响国人心灵的原典之译本)。

文明若无前世,焉有今生?学术若无前人,焉有来者?

借助古典派(以及传承古典派风范的部分现代派)重归人文世界的时空之旅,对于企求定位自身世界身份的任何社会——尤其是我们这个曾经有过自己的“天下”的社会——而言,意义不言而喻。

译述古典派论著,对于纠正“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学术作真正的积累,造就一个真正的“中文学术世界”,意义更加显然。

王铭铭

2012年9月29日

译者前言

细心的读者翻开扉页,可能会被吓到:这本书首版于1908年,距今一个世纪有余!

这样一本书,又不是哪位名家的大部头传世经典,只是一百多年牛津大学的六个讲座之合集,却在今天进入中文读者的视野。

它的价值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背景、不同学科(比如,人类学与古典学)的读者或会有不同的答案;而我作为译者,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借用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我不愿意做着自己不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只有在有意义的工作中,我才愿意消耗我的生命。譬如我可以在深夜里,在旅途上,不觉得疲乏地写这本书,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心目中很明白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意义就在这书的本身,而不是在从这工作所得的报酬中间接得来生活上的满足。”^[1]

无论如何,翻开这本书时,一个个妙趣横生的话题大概已经能使读者把这个问题直接忘掉了。在发展出字母文字之前,欧洲各地的原始族群如何使用图画来记录、书写?他们的“象形文字”是怎样的?简化图案是否成为字母的原型?“图形符号在欧洲的传播及其与文字起源的关系”中,二十几幅精巧的插图展现了欧洲各地原始“文字”的考古发现。伊文

[1] 费孝通:《机器与疲乏》,《美国与美国人》第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思 (Arthur John Evans, 1851—1941) 是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正是他主持发掘了克里特岛上那传说中的克诺索斯宫殿,也是他提出了米诺斯文明的概念;而在第一讲中,古老的克里特文字系统只是果实,伊文思带领读者欣赏的则是还要更古老的那棵树——太古时期便散布于欧洲各地及爱琴海周围地区的图形与符号。

荷马的作品,即使在中文世界也是家喻户晓——《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描述的社会,有什么可以和人类学及各地传说所提供的线索相互参照?“共主”阿伽门农的权力与义务为何?贵族封地、财产的状况?匠人、奴隶、女性的地位?战争使用的武器?丧葬仪式与鬼魂信仰?奥德修斯的故事与全世界原始民间传说的可比性?朗格 (Andrew Lang, 1844—1912),我们可以称他为人类学家,不过他更鲜明的形象是个兴趣广泛的文人,热衷于各地神话传说——以及荷马;而第二讲的标题简单明了:《荷马与人类学》。

相较于荷马那“严肃纯净”的品味,荷马以外的希腊史诗似乎保留了更多怪力乱神,令学者兴奋的元素:巫术与净化仪式、野兽崇拜、石头崇拜、鬼魂、神祇化形……莫瑞 (George Gilbert Aimé Murray, 1866—1957) 是著名的古希腊学教授,同时也是剧作家、社会活动家。在第三讲《荷马以外希腊史诗传统中的人类学》中,莫瑞主要分析了秘密社团、试炼、显圣、人类兽化等,穿梭于希腊神话与美洲、新几内亚、西非等地的人类学材料之间;他以“药师-王”的概念分析诸多希腊神话中的王/神,而重头戏则是《神谱》中的三个元素:“吞噬”“石头”“匿藏”。

第四讲《希腊、意大利巫术》引用的经典文献是最多的,对词源的分析也是最多的。托雷斯海峡澳大利亚中部巫师的“唱”,是一种有节奏的低声沉吟,而“唱”的内容是“愿你的心分为两半”或“愿你的头和喉咙断开”;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否有这种巫术性质的“唱”?“唱”的内容和对象是什么?哪些文句表达了对女巫力量之信仰、对言辞力量之信仰?杰文斯 (Frank Byron Jevons, 1858—1936) 也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跨越

多个领域,以现代的分类而言包括古典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这一讲中他还就出土的“钉咒之板”上面的铭文做了许多有趣的分析,比如:施术者有时靠自己的力量,有时祈求神灵,有时甚至命令神灵赶快为他办事!

迈尔斯(John Linton Myres, 1865—1954)的第五讲是《希罗多德与人类学》,在这位学者的眼中,希罗多德不仅是公认的“历史学之父”,同时也是伟大的人类学家,是“人类学事实的警醒观察者”,赫西俄德、米利都学派的阿纳克西曼德和阿基雷乌斯、埃斯库罗斯等对人类事实的观察和论述,到了希罗多德这里更进了一步;在希腊人传承的思想中,关于不同人类的理论是怎样的?如何解释种族的差异和风俗的差异?他们惯用的词汇有哪些?希罗多德为什么特别留意收集各地族群的婚姻习俗,和食物来源这两种资料?最后,苏格拉底的政治学思想与这些早期的人类学观察与思考之间,隐藏着怎样的联系?

最后一讲是我认为文字最优美的一讲,弗勒(William Warde Fowler, 1847—1921)这位罗马宗教专家从各个方面分析了古意大利的“净化仪式”*lustratio*,它来源于早期山林中的居民驱逐无处不在的邪恶精灵,因此必须带上祭品,绕行土地的边界,再加上恰当的语句,以使界限带有某种神圣的隔绝力量。从农场、到村落、到城市神圣的城墙,甚至到军队,古意大利人一直保留着这种庄严、缓慢、有序、渐进的游行仪式,虽然没有从中发展出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观念,但这种仪式融入了罗马教会,甚至在今天仍能看到它遗留的痕迹。

最后说说编者马雷特(Robert Ranulph Marett, 1866—1943),他较广为人知的有两点:第一,他是人类学学科创始者 E. B. 泰勒的学生,1910年泰勒退休后,马雷特继承了他在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职。第二,他提炼了美拉尼西亚的“玛娜”概念,认为比泰勒关于宗教起源的“万物有灵”论说更精确的是万物都充满了神秘力量“玛娜”。

1906年人类学委员会在牛津大学成立,主要目的是为两年后的人类

学教学工作做准备。1907年,马雷特成为人类学委员会的秘书并活跃其中。如前言所述,本书的六个讲座便是由人类学委员会主办,尔后由马雷特进行编辑。这也是他名下的第一本书,其后陆续出版了《人类学》(1912)、《心理学与民俗学》(1920)、《宗教的原材料》(1929)、《宗教的门槛》(1929)、《原始宗教中的信、望、爱》(1932)等作品。学术上,他可说是继承了19世纪进化论一脉的旨趣与风格,而后期人类学主流已经转向,因此他本人的学术影响并不大。

无论如何,一百年前的六个讲座,对今天的中文读者而言,我想其意义并不在于具体学术观点之正确与否,而在于为读者提供思路与启发。至于文中不时透露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倾向,也请读者莫与古人计较吧。

至于翻译工作本身,不得不说难度非常之高。一来讲座内容跨度极广,二来对这些百年前的学者而言,大抵古希腊文、拉丁文、欧洲诸国语言皆是信手拈来,散见于文章各处,引经据典,时常并不加以译解。然而他们可以假设其听众有着同样的学术背景,我却不能以此作为偷懒的理由。因此,我以保持正文流畅为原则,零散词汇尽量译成中文;如正文乃就某词汇做语义分析,则仍保留该词汇原文;如正文成段引用古籍中文字,则尽我所能翻译之余,仍将原文附上,以便读者根据阅读之目的自行取舍。

人名、地名、书名、术语等,除了个别有固定译名,大多数仍需译者自行翻译。我深知译名不统一造成读者许多困惑,因此尽量将人名、地名、书名、术语之原文置于括弧中,供读者对照参考。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隆国及 Mutschler 老师的帮助,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向他们请教过拉丁语及古希腊语。当然文中如有任何失误,皆是译者责任。水平有限,唯尽力而已,望读者不吝指正。

何源远

前 言

字面上来看,“人类学”与“人文科学”似乎有着相同的疆土,但实际上它们却将人类文化的领域一分为二。人类文化的种种被归为两类,一者较简单,一者较复杂;或者说,一者较低,一者较高,虽然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说(从我们的成就来看,我想这种说法确实是不对的)。遵循传统,人类学把自身局限在较简单或较低级的文化上。另一边,人文科学则可溯源至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他们的研究内容,象征着社会生活中较高的层次。

这样一来,两者中间的过渡现象又该如何解释?那里只是一片无人荒地吗?是一片刻意不予开发的隔离带,因为担忧野蛮人的远亲和文明的近邻会在这里吵起架来?显然,为了科学,两边都应该容忍,不,应该鼓励一种温和的穿透。人类学向前看,人文科学向后看。除非偏见作祟,两边兴趣的交叉是绝不会产生分歧的。

事实上,又怎么可能有分歧呢?就像这卷书中的每一位作者,人类学的焦点、古典知识与考古的关注,都正是同一个人的兴趣所在。伊文思博士不仅是史前欧洲研究的权威,还复原了克里特文明时代的面貌,给予希腊历史一个崭新而恰当的视野。朗格博士是著名人类学家,这门学科中,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提出如此之多新颖而丰富多彩的假设;在这之外,他还有暇(他有暇做了许多其他事情!)翻译荷马,并且证实了荷马本人的存在。在这里,莫瑞教授可以利用他那少见的同情共感的洞察力,去重新解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音乐;可以去分析构成希腊史诗的基本元

素。杰文斯校长以其对宗教早期历史的天才假设而闻名；但他同时也花费大量心血研究欧洲考古，而他编辑的普鲁塔克（Plutarch）的《罗曼问题》（*Romane Questions*）对古典遗产的学生来说无比珍贵。迈尔斯教授，在教授希腊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是个专业的考古学家，而我们如何表达敬意都不为过的一件事是：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牛津大学得以建立了一所卓有成效的人类学学院，其中迈尔斯教授出力最多。最后，弗勒先生，在他所有朋友眼中简直就是“人文”（*Humaner Letters*）的活化身，他既是研究希腊—罗马城邦的历史学家，又能巧妙利用比较的方法，从庄重而略显缺乏灵魂的罗马仪式中，淬炼出人文意义。除非我们要把这些出色的人和分裂病态双重人格联系在一起，否则我们无须质疑，他们既是人类学家也是人文学家，能够从学科的两端进行精确的操作，就像聪明的工程师从隧道的两端都能开始工作一样。

不过，公平地说，当前的第一步是从人类学这边迈出的。书中六个讲座由人类学委员会主办，于1908年第一学期进行。此机构从创办之始便一直认为有必要引导古典学者来研究较低层的文化，因为高层文化必是从中孕育而生。当然，人类学必须经常转而注意雅典罗马这条路以外不同的发展进程。但对我们、对我们的科学来说，这条路仍然是社会演化的中心，是一条决定性的路径。简单而言，被莱基（Lecky）喜悦地称为“人类思想的欧洲时代”这一时期的黎明阶段，应该是人类学不懈的关注焦点。

最后，必须就书名做一点说明。我们之前提到过关注点的交汇，对此“人类学与古典学”是一恰当的表述，本书每一篇的作者都用他们的人生和作品完美地演绎了这一交汇。不过，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可能会说，不管这个书名对所有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多么合适，每个作品分开来看，似乎都无法套用这个标题。就算事实如此，其实也无关紧要；但事实确实如此吗？伊文思博士的讲座是个开头，还未跃进古典时期之前，我们蓄势待发；即便从穴居人开始讲起，但也已经跨入门槛抵达了克里特。荷马，赫

西俄德,希罗多德——把这些归类于古典学不会遭到任何质疑。剩下的还有罗马的课题,巫术与净化。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古典的呢?用现在生物学的语言来说,希腊的文学是先天的,罗马的文学大部分是习得的。因此罗马没有“日出前的歌谣”;它的“历史之父”不能再生。它的灵魂和肉体一样都是进口的。罗马人模仿起希腊与东方,拉提姆的巫术——宗教信仰不再受欢迎。然而原生的本质终究会冒头;何况罗马人非常虔诚,喜欢“追根溯源”。为了更好地欣赏拉丁经典中最伟大的维吉尔(Virgil)(让我们回到古典学正宗),我们至少应该把他当做一个古董收藏家。最后,这些文章只能说是“第一批收成”(vindemiatio prima)而已。未来当收获完成,在古希腊与罗马的经典这方面,我们就能够明了到底有多少旧事物继续活跃于新事物之中,我们也能够判断学生匆忙地套用“遗留物”这一标签是否恰当——当“遗留物”所指的这股力量仍然拨动着最智睿而尊贵的文化传人之心弦。

R. R. 马雷特

目 录

总序	王铭铭(1)
译者前言	(5)
前言	R. R. 马雷特(9)
第一讲 图形符号在欧洲的传播及其与文字起源的 关系 /A. J. 伊文思	(1)
第二讲 荷马与人类学 /A. 朗格	(30)
第三讲 荷马以外希腊史诗传统中的人类学 /G. G. A. 莫瑞	(44)
第四讲 希腊、意大利巫术 /F. B. 杰文斯	(63)
第五讲 希罗多德与人类学 /J. L. 迈尔斯	(83)
第六讲 净化仪式 /W. W. 弗勒	(114)

第一讲

图形符号在欧洲的传播及其与文字起源的关系

A. J. 伊文思

曾经,古典学家普遍认为在引进腓尼基字母之前,古希腊并没有发展出完善的书写系统。现在这种看法基本破灭了。这种假设不仅无端地缺乏想象,更是对世界各处原始族群提供的证据故意视而不见。

施礼曼(Schliemann)在迈锡尼(Mycenae)的发现展现了一个早期文化所能达到的程度;那么对比来看,我们能够相信这个文化在书写交流方面,比红种印第安人还要低级吗?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有明显缺陷,这一缺陷显然终究需要填补。我正是带着这种自信开始有关克里特的考察,而现在,发现的结果已使整件事毫无争议余地了。克诺索斯(Knossos)宫殿和其他地方出土的泥版,证实了克里特人在古典希腊第一份书写记录出现的一千年前,就已经经历了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演化中的每一阶段。

证据表明,先有一个简单的图形符号阶段,然后从中衍生出相约俗成的象形文字系统。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些早期元素将进化为一种非凡的发达的线形文字,我们知道这种线形文字的两个互相关联的形式。

我会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米诺斯(Minoan)世界发展出来的这种完善的书写形式。^[1] 现在我希望你们把这些欧洲土地上文字的第一份果实,

[1] 我即将出版的著作与此相关, *Scripta Minoa*, Clarendon Press, Oxford。

与那棵古老的树联系在一起,留意蔓延的根茎与树枝,等待着开花结果的时机到来。这棵古老的树,便是那些原始的图形书写、符号书写,从太古时代起散布于欧洲各地及爱琴海周围地区。

我们接下来会对遗留了古代图形符号的各个地区进行一次通览,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注意一个在时间上和环境上都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所在,它名副其实地属于一个旧世界。

我说的是“驯鹿时代”(以其最广泛的含义而言)的壁画和雕刻,这些无与伦比的证据显示了图形以及符号的运用,其中有些甚至用得太多以至于变成某种“字母图形”。

我们或许可以用“书写图画”来描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穴居人行为。绘画与蚀刻的各种动物中,有驯鹿,野牛,还有些更危险的,如长毛象,洞熊,狮子,无疑这些都是亲身遭遇的纪念。至少在一个例子中我们确切地看到狩猎的表述——在一只驯鹿角上,雕刻着赤裸的人在追踪一只长角野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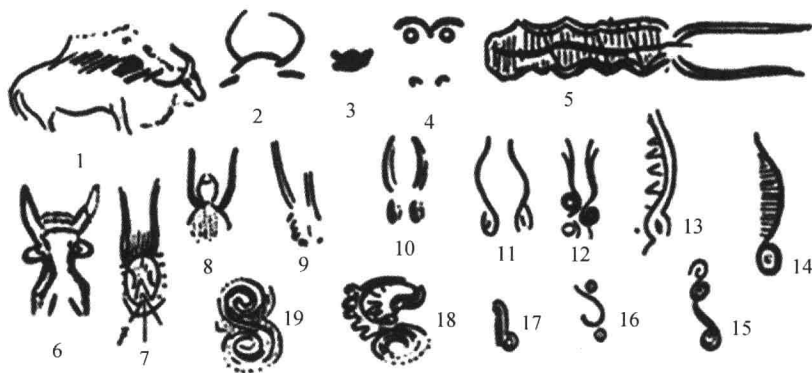


图一

除了这种较详细的图画故事之外,新材料的发现使我们对旧石器时代“图画书写”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视野。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众人的耐心调查。在西班牙桑坦德(Santander)附近的阿塔米拉洞中(Great Cave of Altamira)、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另一端的玛索拉斯洞(Grotte de Marsoulas),以及法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彩色壁画,以全新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原始的艺术。不仅如此,这些山洞墙壁上的图画或蚀刻一层覆盖着一层,为我们了解这种艺术的阶段递进提供了新颖而宝贵的证据。我们面对的是几乎无穷无尽的“复写纸”。

不过当下对我们而言关系最密切之处在于,除了那些更大、更复杂的图像,在这些岩石复写层的最下层,出现了简化的图形和线性符号,其中一些已经可被视为真正具有“字母图形”的特征。

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证据。另一方面,相反的过程——即从更具体的图像到与其相对应的线性化的简写,经常能从一系列图形中看出。例如,布勒依(Abbé Breuil)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图表,显示马头、羊头、鹿头和牛头的逐渐简化和符号化。^[2] 我们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他的所有看法,但是毫无疑问,一个作为整体的演化系列清晰可见。图



图二

[2] 'Exemples de figures dégénérées et stylisées à l'époque du Renn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1906. *Compte Rendu*, t. i., pp. 394 seqq.)